

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基础,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如何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改善民生需要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自我改进,更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政策实施来实现,而这些都需要理论支持。

产业结构优化催动经济发展

高志文 李莉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并促进社会不断增长需求的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的过程。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在产业与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即促进产业结构的动态均衡和产业素质的提高,它是一个动态过程;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或者说产业结构由较低水平状态转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即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知识化、高资本密集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发展的动态过程。

优化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产业结构优化会带来一个国家和地区 GDP 的增长,即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数量的增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其次,产业结构优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发展包括经济数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高;是否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趋于合理,初级产品与加工工业的比例趋于合理以及基础产业与非基础产业的比例趋于合理等。

(2)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要协调,产业结构必须合理,即产业间的发展比例要协调,产业之间要相互服务、相互促进,一个产业的发展不能以削弱另一产业的发展为代价,要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经济发展要持续,需要将经济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长远发展的规划结合起来,使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长期持续发展,即尽可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那么产业结构必然要不断地优化升级。

(3)产业结构的状况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与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不同,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不是经



参加论坛的部分学者进行分组讨论
鹿娟/摄

济规模的扩张、数量的增加,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而是产业结构的状况,即产业结构优化的程度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4)产业结构的状况是经济效益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效益高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因此说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对当地的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产业结构是决定资源在产业之间能否优化配置、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

经济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在要求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实际上是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更加注重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经济数量的增长,结构的调整、质量的提高,又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既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又提出了产业结构必须改善的要求。

(1)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首先是数量的扩张,表现在 GDP 或 GNP 基数的增长,与之相伴随的是人均国民收入也会发生显著变化,就会使消费需求结构也有着相应的变化,当社会对某些产品的需求远远超过供给时,生产这些产品的部门由于产品价格上升,从而使这些产业部门的单位资源产出效益大大提高,此时社会就要满足产出效益高的部门对资源的需求,将产出效益低的部门中滞留的过剩资源转移过去,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并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首先会带来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随之必然带来人均国民收入的高收入率,接着便引起需求结构的高变动率。尤其是当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一定水平时,社会的投资将会全面增加,技术变革的速度将会大大加快,新兴产业的成长将会加快和扩大,这就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一点对于经济正处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表现得更为突出。

(2)经济发展引起产业结构变动,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结构、产出结构、分配结

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的协调变化,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环节,其中产出结构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农产品大量剩余,一些农业生产要素便会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比重下降。这种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产业结构的重心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变的过程,正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

(3)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经济质量的提高,这是一项综合性的指标,其中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是居民实际生活质量的提高、就业市场的稳定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等指标。要想达到以上指标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在一定条件下,优化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并进而影响着国家的总体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经济的发展也将导致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调整,不断地进行优化升级。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是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不断发展的过程。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

用经典解读今日中国经济现象与民生问题

余斌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在当时的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的十个办法。这些办法对于今天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逐条参照这十个办法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相应的促进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政策建议。

尽管 20 多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上述“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但毕竟《共产党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那时“还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今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当年最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相比,是只高不低的。因此,如何促进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我们不妨从《共产党宣言》的分析开始。

征收高额累进税

累进税制已经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但是,由于中国的私人企业主通常将自己的生活开支列入自己的企业开支中,也不怎么给自己分红,从而其账上没有什么个人所得,因而逃避了不少个人所得税。为此,应当规定企业的留存利润不得超过 50%,超过部分应当与企业主的其他个人收入合并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再计入再投资;同时还要规定所有再投资或增资的金额都要经过审查,确认是缴纳过个人所得税后所余下的收入才可用于企业经营。

对于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层的收入,则不能仅仅是用高额累进税来调节,而是要加以更加明确的限制。这些高级管理人员并不比当年英国工人合作工厂里的经理辛苦多少,也不比今天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更辛苦,其担负的责任也不比国家领导人更大,因此,即使有理由拿与国家领导人同样高甚至略高的薪酬,但是他们因而也没有理由拿上千万人民币的年薪。应当严格限定国企高管包括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的收入都不得超过该企业普通职工平均工资的 10 倍,要坚守 280 万元人民币的最高上限。

废除继承权

这个办法目前缺乏实施的条件,因为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为此,应当首先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对于不动产、上市公司股票和实名制的银行存款部分,可以由国家直接根据房地产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和银行的记录进行征收,否则相关资产不得过户。对于动产部分,可以由个人申报缴纳。尽管对于这一部分存在核实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不应成为拒绝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理由。这是因为,只有开征相应的税收,才有可能去进行核实,才有可能去提高核实的技巧和准确性。

对于征收上来的遗产税和赠与税,要专项用于改善民生的社会保障支出。

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2008 年,美国全面爆发金融危机后,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向其主要的几家大银行注入大量资金救市,甚至取得控股权。尽管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时刻准备着退出这些银行,但这些做法毕竟已经说明了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的重要性。那么,中国就更应该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民间的金融机构可以进行股权融资活动,但不能进行信贷活动,以此降低最后会转嫁到国家身上的风险。同时,要修改《破产法》,推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破产保护制度,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以免私企和外国从国家银行借款,然后将坏账交由国家买单。

把运输集中在国家手里

目前尚不能做到这一点。目前中国公路运输业自由竞争过于激烈,各种货车车辆超限超载的危害非常大。应当逐步在公路运输业推行集中化改革,尤其是要将跨省运输业集中到三四家大的国有运输企业中,这样既能保持竞争,又能避免竞争过度。同时,也方便从源头上治理车辆超限超载。铁路和航空运输则要坚持控制在国有企业手中,不能搞私有化改革。

促使城乡差别消灭

这是解决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这个所谓“三农”问题的根本,也是促进城乡公平和提高农村效率的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普遍采用了安徽省小岗村的改革模式,使中国的农村经济退回到小农经济状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也造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而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模式,虽然强调了经营大农业,但是由于忽视了工业的发展,因而也不成功。只是到人民公社后期,江浙一带摸索性地发展起社队企业,并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乡镇企业。这些地方的农村经济才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而实际上,早在 1963 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中文版中,恩格斯针对当年德国衰落的自由农民阶级的复兴,继《共产党宣言》之后,再次对德国农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采用这样一种更新公社土地占有的方法,以便使这种占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业机器的全部好处,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去经营(除农业以外)利用蒸汽和水力的大工业,不用资本家,而依靠公社本身的力量去经营大工业。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换句话说,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聚集城市,必须使他们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而这只有大规模地利用蒸汽或水力来经营,才能对他们有利。”

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应当在城市里扩张,而且还应当办到农村去,建设真正的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体意识回归将影响经济发展模式

市场经济具有阶级重构性,是一只驾驭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看不见的手,对政治生活具有俘获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解决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要摆脱完全的市场依赖路径,要提升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体性。

石翼平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手段

近年来面对市场化改革后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的问题,大体有这样几种学说和判断:正统学说是先肯定成绩是主要的,同时承认问题的存在,并承诺加以解决。主流经济学界则有几种说法,一是代价说,认为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二是基本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如一些经济学家根本不承认贫富分化的存在;三是改革不彻底说,认为问题的出现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四是动力说,即问题是动力。如大规模外化有鲑鱼效应,贫富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主流经济学家上述几种说法中,改革不彻底应是占主导地位的说。

目前正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市场经济”定义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由于“方式”在汉语中与“方法”的词义基本一致,而“方法”与“手段”在使用上往往可以互换,因此“资源配置方式”的定义事实上是为“市场经济是手段”做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注脚。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定义似乎是来自西方经济学,但细辨一下,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概念与我们的市场经济概念是有重要区别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概念强调的是“方式”或“手段”性,实际内含着市场经济的可利用性和可驾驭性的判断。而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概念恰恰强调的是它的自发性和市场对社会主体的驾

驭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亚当·斯密才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手”。而且清楚地描述了它的驾驭性,即社会主体“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西方经济学认为,正是市场经济的这种自发性和驾驭性才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西方经济学中也没有“利用市场机制的说法”。目前常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出现的“政府调控”或“政府干预”,往往在理论上被理解为调控市场或干预市场,并认为西方经济学也是这样主张的,这是一个极大的理论误区。西方经济学中政府干预的或调控的对象不是市场,而是经济活动本身。市场是以价格和竞争机制为主体的一套经济运行机制,它是不能调的,政府调控并不是要改善市场机制,而是要改善“市场结果”。这一点被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列为所谓“十大经济学原理”之一。最早系统提出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说,主张的不是干预市场机制,而是干预市场运行结果。原因是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活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干预是补市场机制之不足,而不是干预市场机制本身。

对市场经济预估程度不足

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中,在社会文化、价值观、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虽然意识到了市场经济的影响,但对市场经济影响的预估程度不足,基本思路可能是认为既然市场可以被利用,对其影响就可以较为容易地加以驾驭和控制。可现实的基本趋势

是,社会精神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几乎完全被嵌于市场经济当中。这恐怕是出乎市场经济推动者预期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上空前的艰苦探索,不能将其简单化为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工具化的利用。其探索成功标准也不是简单的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同志虽然说过“发展是硬道理”,但也提出要防止两极分化和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因此,探索成功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建立一种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市场经济,避免使基本劳动群众沦落的社会阶级重构,避免社会精神文化、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形态复归于传统市场经济的状态,避免传统市场经济对政治生活和政治运作的俘获。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别无他途。

主体意识回归或成转型动力

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粗放式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相对固化,由此决定了这种发展方式已形成惯性。将这种惯性逆转,仅靠经济和技术性操作是不够的,必须有以提升民众尤其是基本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体意识为目的的社会性操作。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市场化改革已经使基本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体意识严重退化。市场化下的工具主义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使劳动群众曾经具有的社会主体意识基本土崩瓦解,至少是严重削弱。由于社会主体意识的碎片化,以致遇到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问题只能

用“跳楼”这个个体化的方式了结,而主流解读层面对这类事情也只是做个体化的解读。这种社会主体性衰减的社会转型,完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不匹配。前者无法对后者形成良性推动,发展转型仅表现为政府手段的强推(如一些地方限制电力供应的所谓“倒逼”转型),而缺乏社会主体意识提升所天然具有的助推机制。提升民众尤其是基本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体意识,本是执政党的强项,传统说法就是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这个优势应当重新发扬、充分发挥。为此,还是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重塑劳动群众的主体意识提供基本的制度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为劳动群众主体意识的回归提供精神支持。这样,社会主体意识的回归也会得到有序化、合理化的表达,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动力。

社会主体性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标志之一,社会主体性的提升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西方资产阶级在其取得统治地位初期,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体性表达是强力打压的,而随着阶级统治经验的成熟,资产阶级成功地将这种社会主体性引导和调控到资产阶级统治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使这种主体性成为释放统治压力的减压阀,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方式转换提供了社会动力。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成熟性,这一历史经验倒是颇有教益的。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